

大贪污犯“坐穿牢底”体现公平

李 记



今日论语

24日,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刑法修正案九(草案),三审稿新增规定:对犯贪污、受贿罪,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,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,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、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,终身监禁,不得减刑、假释。这意味着,因贪污、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员,虽然有可能“免死”、减为无期徒刑,但是经过法院的裁定后,或面临终身服刑,没有申请减刑、假释的机会。

全国人大常委会强调,增加“重特大贪污犯罪不得减刑假释”规定,“防止在司法实践中出现

这类罪犯通过减刑等途径服刑期过短的情形,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”。有专家也解释,三审稿针对贪污受贿犯罪制定的限制减刑、假释规定,达成了一种平衡,“既能体现严打腐败的从严一面,又能达成控制死刑的目标”。应该说,这一新规,是对公众反腐情绪的回应,也有一定的法理基础。此前不断有人指出,落马高官被判处死缓后,如果减为无期徒刑、再减为有期徒刑,仍有机会重见天日,死缓成为官员的“免死牌”。三审稿增加“终身监禁”规定,能有效避免这一问题。

按照解释,之所以未对所有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都出台限制减刑、假释方面的规定,主要是从我国的刑事政策方面考虑,“刑罚的

根本目的和根本目标都是教育、改造,如果对所有最高刑为死刑的罪行都限制减刑,打击面过宽,一方面违反刑罚的目的,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;另一方面也对监狱造成了很大负担”。只是,对“普通死缓”,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后,可以减刑假释;对“特别死缓”,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后不得减轻假释,终身监禁。以普通公众的视角,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罪犯是“普通死缓”还是“特殊死缓”,如何界定?

这个标准一定不能模糊,否则又可以被人拿捏,死缓岂不是照样可以成为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官员的“免死牌”?“正义不仅要实现,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”,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相比其他犯罪分

子,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人员,确实能获得更多的人脉、财源等软硬件支持,可能“辗转腾挪”判处死缓、减为无期,再减为有期,进而“越狱”,应该被“重点关注”。任何时候、任何情况下,法律都该是实现公正的手段。法律的公正,既是法律专家们的法治理想,更是社会的共同理想和实践过程。

即便立法程序不断演进、不断完善,但在立法、修法的过程中,还是要尽量避免公众意见被写进法律、但执行却难见其效的情况。因此,在这项刑法新规颁布、实施前,把法理和实践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想得多一点,周全一点,才可能避免立法意向和社会效果两张皮的现象。

公车改革,须从更精准处着手

权威声音

剑指“车轮上的腐败”的公车改革启动以来,效果如何?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,情况不容乐观。在今年7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中,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问题仍然最突出,达到680起。

公车改革初期,那些与公务需求完全无关的“特权式”私用,是引起社会普遍不满的突出现象。从改革的视角看,严抓作风以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“特权式”公车私用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突破口。

然而,要祛除“特权式”私用,不仅要治标,更要治本。前者比如抓作风,比如严格管理,从根本上说动的只是一些人的不当利益。但治本,比如取消一般公务用车,因为改的是“存量”,势必会动很多人的既得利益。这也正是一些人表示“不理解”“不情愿”的原因所在。

现实问题客观存在。比如,有些工作岗位需要经常下乡,缺乏公务用车的确给工作带来不便;有的单位核定车补后,一些职工出勤出差需要“倒贴钱”;还有一些地方“公务出行多而级别低的拿得少,公务出行少而级别高的反而多拿”。诸如此类的情况,使各地的改革在进度上参差不齐。这其中既有公车的福利享受问题,也有实际公

务需要和具体差异因素,这就需要精确发力、精准用力,才能让公车改革向前迈出关键一步。

具体而言,就是要在设计制度时最大限度考虑到不同地区、不同工作性质和不同层级的公平

和公正,不宜一刀切。与此同时,对那些潜伏在暗处的作风顽症,比如名为“公车服务平台”,实为领导“专车”的现象,也要给予更加精准的监督。(杰文津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“伟哥”酒

“说能延年益寿,喝后精神抖擞。黑幕终于揭开,原来是酒中伟哥。”食药总局称,有69种保健酒、配制酒违法添加西地那非(俗称“伟哥”的药品成分)等化学物质,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停止生产,并召回在售产品。

潘顺祺 画

自由谭

傍名人,似乎自古便是传统。傍名人的方式有很多种,比如本与名人无甚关系,却东拼西凑,非要找出点沾亲带故;再比如,与名人无甚交情,却谰托知己,两人似乎是一起同过窗、睡过炕、扛过枪的莫逆之交。鲁迅就嘲讽过这类人:一睽之后,言行两亡,于是无聊之徒,谰托知己,是非蜂起,既以自诩,又以卖钱,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,这倒是值得悲哀的。

当前,还盛行另一种傍名人。比如日前落马的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,多年来一直占据湖南老家林家坡村“名人榜”首位。当他被查后,其名已从“名人榜”撤掉。周本顺履新河北省委书记时,湖北某大学喜不

名人榜与傍名人

秦 淮 川

自禁,书记和校长“第一时间联名致信,表达热烈祝贺”。按说,这很正常。“今天我以母校为荣,明天母校以我为荣”,互相为荣,是基于校友情之上的砥砺,应该激赏。但是,一琢磨便觉得不大对劲。

周本顺是该校法学院法学专业2005级博士生,在中央政法委员会副秘书长任上,周本顺仅用了一年便获得该校法学博士学位。纵是天才,恐怕也难吧?应该承认,对官员读博不能戴有色眼镜,但周本顺这样拿博士学位,还是不免让人怀疑大学送人情。在去年的全国两会期间,全国人大代表、南开大学

校长龚克直言,“如果是官员真的好学,某种程度上是应该予以鼓励的。不过,考虑到某些资源,特别是本地的官员、主管的官员,送文凭给他,这是利益的输送,有违学术的诚信和利益的公平,所以要防止的是假文凭。”

名人被傍,有时身不由己,但是切莫配合表演。周本顺作为名人,也常被傍被消费。他在回信中称:“(攻读法学博士学位)是我倍感荣幸、十分难忘的一段经历,学校给予我的知识和教诲使我终身受益。”公务如此繁忙,且仅仅一年时间,要说受到多么值得终身受益

的教诲,恐怕多是不实之词吧?

少傍名人就能少出丑,特别是一些学术殿堂和商业场所。胡长清在任时,“东也胡,西也胡,洪城(南昌)上下古月胡;南长清,北长清,大街小巷胡长清。”落马后,南昌大街小巷铲字忙。爱题字的王立军也是如此。

哪怕与名人很熟,不傍名人,就显得很自信,也有风度。现代乡土作家台静农与鲁迅亦师亦友,也被视为鲁迅的嫡传弟子,按说他最有资格拿鲁迅说事,以与鲁迅深交为荣,但他没有。后有学者研究台静农,发现鲁迅的杂文、札记、书信中多次提及“台静农”,不免对台先生敬重有加。那些谰托知己者,与台静农相比当抱愧。

不以名人自居,不傍名人,不做虚骄之事,可安心矣。



新民随笔

中英教育 哪家强

邵 宁

中国老师来了。

近来,英国人对中国基础教育的兴趣有增无减。先是去年英国教育大臣来上海取经,随后派来一批教师,走进上海中小学课堂,观摩中国老师怎么上数学课。之后,应英方要求,上海派出60名优秀小学老师去不列颠岛教数学。英国教育部官员坦言:“这么做主要源于英国学生的数学水平普遍低于远东地区的同龄人,而数学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。”

更有甚者,中国的强化操练模式也在悄悄向英国渗透,连《一课一练》也有了英文版,网友称“折磨中国小朋友的教辅又去折磨英国孩子了”!最近一部以中式教育走入英国课堂实验为内容的纪录片走红,这是一场以成绩定胜负的中英教育PK,最终以中式教育考试成绩胜出收场。此结果引发了中英两国的广泛关注和议论。

如此看来,中国的基础教育是不是超过英国了呢?事实上,大多数中国人持否定态度:中国只是应试教育厉害,但压抑孩子的个性和创造性,不然,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把孩子送到美国、英国去留学呢?甚至出国读中学的也越来越多了。英国舆论也认为:中国教师用灌输式的授课方式、学生死记硬背式的学习方式、超长的学习时间,才取得了好成绩。

英国人持续前来取经,至少说明一点:在数学教学方面,中国有着相当大的优势。欧美一些国家的数学教学水平的确不令人乐观。据美国一项调查,对于“14除以2”这样的题目,美国中小学教师中,10个里有7个不能给出正确答案,而中国100%的老师都能给出正确答案。

当然,中国教育引起西方国家的兴趣,不仅仅因为数学。除了英国、美国、澳大利亚等一些发达国家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中式教育。近年来,中国GDP总量已是世界第二,而中国教育经费的投入占GDP的比例达到4%。这也是中国教育不断提高的原因。也正因为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,使得世界各国希望从教育中寻找答案。

应试教育、“考试工厂”弊端明显,“一切以孩子为中心”的无压力教育也有缺点。中英教育哪家强?或许没有答案。但如果两者能够互补,则都能获得提高。